



海洋
与
中国

海洋迷思

中国海洋观的传统与变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洋迷思: 中国海洋观的传统与变迁 / 黄顺力著. —南昌: 江西高校出版社, 1999.12
(海洋与中国丛书 / 杨国桢主编)
ISBN 7-81075-007-0

I. 海… II. 黄… III. 海洋学史 IV. P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41073 号

海 洋
与
中 国

海洋迷思

——中国海洋观的传统与变迁

黄顺力 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96号)

邮编: 330046 电话: (0791) 8512093 8504349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江西恒达科贸有限公司照排部照排

封面印刷: 江西新华印刷厂

内文印刷: 南昌市光华印刷厂

1999年12月第1版 1999年12月第1次印刷

850mm×1168mm 1/32 11印张 205千字

印数: 1-2000册

定价: 27.80元

ISBN 7-81075-007-0/k·002

(江西高校版图书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总 序

中国是一个兼具陆海、生态环境多样性的大国。海洋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重要环境。现今中国的版图内,有 1.8 万余公里的海岸线,1.4 万余公里的岛岸线,沿海岛屿 6500 多个,5 大海域的海洋国土达 300 余万平方公里,相当于陆地国土的 1/3。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地向海洋进军,发展了自己的海洋经济、海洋社会和海洋人文模式,积淀了丰厚的文化,体现了中华文明海洋性的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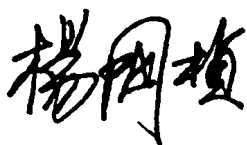
中华民族有光荣的海洋发展传统,也经历过从海洋退却的严重挫折。向海洋开放,曾使中国传统的海洋产业、海洋贸易和海洋科技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厉行海禁,压抑向海洋发展的传统,曾使中国丧失海上竞争的优势,处于落后挨打的地位。走向海洋与忽视海洋的选择,关乎国民经济和社会文明的全局,这是我们的先辈付出沉重的历史代价换取的认识。

21 世纪将迎来海洋大发展的时代,世界各国都在调整自己的海洋发展战略,力图在新世纪抢占海上竞争的制高点。中华民族面临复兴海洋发展的机遇和挑战。贯彻、落实海洋发展的基本国策,重振海洋大国的雄风,不仅是海洋界、经济界和政府部门的事情,同时也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界的积极配合。

提高全民族的海洋意识,需要发达的海洋人文社会科学。国民海洋意识的普遍薄弱,植基于历史上重陆轻海的社会价值导向和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不发达。当代中国的海洋性研究虽在一些人文社会学科领域取得突出的进展,但尚未出现海洋政治学、海洋经济学、海洋社会学、海洋法学、海洋管理学、海洋旅游学、海洋军事学、海洋史学、海洋考古学、海洋文学、海洋民族学、海洋文化学、海洋民俗学、海洋宗教学等的全面振兴,更没有形成多元综合的学术体系。沿海地区、海洋国土和中国人从事海洋活动的外海区域,蕴藏着大量中国海洋社会人文成果和信息,有待进一步发掘和阐扬。

中国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建设,是一项跨世纪、高难度的理论工程,需要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海洋与中国》丛书有志为此做基础性的学术累积。首期出版的各册,都以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和海洋社会人文的视野,从不同的角度展示先人向海洋发展的努力、成败和荣辱,在吸收消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挖掘民间和海上的各种中国海洋社会人文资料和信息,探索运用多学科整合的研究架构,重新审视中国海洋经济、海洋社会和海洋人文的价

值,力争有所突破,为下世纪最终达到融合创新,重塑中国海洋文明奉献一份绵力。希望这一尝试能得到各方面的理解、帮助和支持,唤起更多人文社会科学人士的关注和投入。同时也希望它的出版,有助于全社会更新观念,提高对中国海洋发展重要性的认识,造成关心、支持、投入海洋发展的人文氛围,迎接中国海洋经济、海洋科技和海洋社会人文大发展的 21 世纪!



1998 年元旦

致读者

大约在 2500 多年前,中西有两位先哲对人类如何利用浩瀚的海洋,曾作过大致相同的判断。古希腊的哲人以先知先觉的口吻断言:“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一切”。古中国的哲人则以极为精炼的语言揭示:“历心于山海而国家富”。2000 多年过去了,中西先哲对海洋的作用虽然有相同的认识,但中西所走过的道路却完全不同,这其中的原因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深的思索。

—

人类通过各种实践活动,包括经济、政治、军事等在内的实践活动所获得的对海洋本质属性的认识,我们称之为海洋观。作为太平洋西岸的陆海两栖型大国¹,中华民族的先民早在远古时期便已从事各种海洋实践活动,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对海洋的认识,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海洋观念。但长期以来,在以大陆传统农业文明为中心的主流文化影响下,非主流的海洋文化被湮没不彰,尤其自从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提出海洋文化²这一概念之后,所谓“蓝色文明”(海洋文明)与“黄色文明”(大陆文明)的区别,在某种程度上便成为西方区别于东方的最主要的文化特征,从而论定“蓝色文明”胜过“黄色文明”、西方胜过东方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黑格尔的这一观点曾流行一时,至今仍有相当的影响。国内外史学界对中国海洋文化,包括海洋观的研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尤其是对海洋观产

生、发展和变化的过程及其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研究更为薄弱。

杨国桢教授指出:“中华民族的形成,经历过农业部族和海洋部族争胜融合的过程,中华古文明中包含了向海洋发展的传统。在以传统农业文明为基础的王朝体系形成之后,沿海地区仍然继承了海洋发展的地方特色。在汉族中原移民开发南方的过程中,强盛的农业文明,吸收涵化了当地海洋发展的传统,创造了与北方传统社会有所差异的文化形式。南中国的沿海地区,长期处于中央王朝权力控制的边缘区,民间社会以海为田、经商异域的小传统,孕育了海洋经济和海洋社会的基因。世界历史发展进程证明,古代西方和东方的海洋国家,都有依据自己的航海与贸易传统,发展海洋经济和海洋社会的可能。由于各国向外用力程度的不同,它们的海洋发展道路、速度和水平,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形成了不同的模式。十五六世纪之交开始的‘大航海时代’,东西方各种海洋社会经济发展道路展开了激烈争胜,其结果是西方殖民掠夺型海洋经济取得胜利。西方资本主义兴起,并在十八九世纪发展为主导世界历史进程的近代社会模式。”³

历史事实的确如此。处于世界历史上“大航海时代”的明清时期,海洋作为世界性商品流通和资本原始积累的主要途径和汇集地,其社会经济属性不断地被人们的海洋实践活动所揭示。在这一历史大转折的时期内,虽然中国社会“传统内变迁”曾引发出新旧交替的冲动,东南沿海地区民间社会以海为田、经商异域为主要特征的海洋社会经济迅速兴

起，并由此带来海洋观念的深刻变化，但明清两朝封建统治者张弛交替的“禁海”政策，却压抑了民间海洋社会经济生长的势头，扭曲了海洋观念的正常发展。结果，在“重陆轻海”、“重农抑商”的传统思维定势得到强化的同时，却弱化了中国人面向海洋、走向海洋的能力，从而最终导致了晚清中国在与西方海上势力的较量中败北。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唤醒了先进中国人的忧患意识，也给传统海洋观带来了有力的冲击，并在此基础上开始了海洋观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变迁过程。但由于传统意识的深层影响，再加上鸦片战争后的数十年间，晚清社会是以被动的方式逐步向近代转型，因此，中国人认识海洋的目光总是显得那么迷惘，迈向海洋的步履依然是沉重而蹒跚。

1998年是国际海洋年，即将到来的21世纪将成为海洋的世纪，许多学者根据历史发展的经验教训都不无忧虑地大声疾呼：“濒临海洋的国家，即使是一个大国，如果它一旦只限于在陆地领域发展，而忽视了海洋，其前途必然是在世界舞台上变成一个弱者，变成一个受欺凌者。”⁴因此，研究和探讨中国海洋观的变迁，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海洋观念本身发展、演变的过程，把握中华文明中海洋文化基因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发展趋势，而且也有助于我们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从思想观念转变的层面审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曲折历程。这对于提高全民族的海洋意识，维护国家的海洋权益，迎接海洋世纪的挑战，有着重要的借鉴和启示作用。

二

迄今为止，学术界关于明清时期中国海洋观发展变化的系统研究专著仍未见到，相关的论文虽对此有所涉及，但因学术目标不尽相同，以海洋观为研究重点的文章也不多见。虽然如此，众多前辈学者在探讨海外贸易、海外移民、海洋交通、海洋经济、海洋航运、“海禁”政策、海防建设、海军与海战、对外关系等领域时，其研究视点已不同程度地触及到此一时期海洋观的发展变化问题。

例如，李金明先生的《明代海外贸易史》、林仁川先生的《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等专著，对明代海外贸易的兴衰，对外开放和闭关所造成的后果，以及私人海上贸易形成与发展、影响和作用等问题作了客观公允的评述。其中前者在第五章中对明代“海禁”政策与倭寇的性质进行深入分析，⁵后者在第九章中论述了海上贸易发展对社会经济、政治思想的影响，⁶对研究明清以来海洋观的发展演变颇具启示。

80年代中期，台湾学者提出“中国海洋发展史”的研究计划，每隔两年，举行一次中国海洋发展史研讨会，主要对海外交通、海外贸易、海商、海盗活动及其社会组织等进行研究，至今已结集出版7本论文集。其中曹永和先生的《试论明太祖的海洋交通政策》⁷、张彬村先生的《十六——十八世纪中国海贸思想的演进》⁸、朱德兰先生的《清初迁界令时中国船海上贸易之研究》⁹、王赓武先生的《华商文化研究》¹⁰、郝延平先生的《中国三大商业革命与海洋》¹¹、全汉升先生的《略论新航路发现后的中国海外贸

易》¹²等，都从不同角度讨论了明清两朝的“海禁”政策及其对海外贸易的影响。特别是曹永和先生的《试论明太祖的海洋交通政策》和张彬村先生的《十六——十八世纪中国海贸思想的演进》两篇文章是有关研究成果中颇具学术功力的杰作。曹文分前言、从明律规定探索太祖的海洋交通政策、从国初经济政策探索太祖的海洋交通政策、从兰秀山居民的叛明试论太祖的海禁以及结语等4部分，对明初的海洋交通政策作了详细的考证和深入的研究。该文作者认为：“自唐末以来，随着中国文化和经济逐渐向东南扩张传播，濒海地区对外贸易也随之发达。”但由于“海外贸易之利，关税之征权，往往很容易成为割据地方政权的重要财源。五代的吴越钱氏、闽的王审知一族、南汉刘氏等；元末则江浙的张士诚、方国珍，福建的陈有定，广东的何真；明末清初即有郑芝龙、郑成功四代祖孙等，海外交通贸易之利均是他们所以能雄踞一方的主要财政基础。明太祖虽登基称帝，开朝立国，但统一大业尚未完成，农业生产未完全恢复时，控制沿海，吸收其利源，另一方面也是防堵地方割据势力的抬头形成，巩固其国基却是明太祖对外交通所抱持的基本态度。”应该说，曹先生对明初为何实行开国海禁政策的这种分析是很有说服力的。与此同时，他还指出：“（明太祖的）海洋交通政策对于国人即励行海禁，对于外商即以朝贡贸易制度管束，是采取闭关主义的消极政策。这种政策过了成宣的盛世以后，由于明室承平，政府制度僵化，官吏观念迂腐，遂成为‘寸板不许下海’，必谨格遵的祖法。因之，自唐中叶以来一

直继续繁盛起来的中国海洋发展，遂遭遇了巨大阻碍，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张彬村先生的文章则主要是根据明朝政府官僚有关海贸问题的建言，以及进行有关海贸问题的决策，来分析明朝统治阶级的海贸思想。该文从海贸与政治利益的关系、海贸与经济利益的关系入手，分析考察了16世纪中期以后明代统治者在海贸方面所发生的新思潮。张先生认为：“这些新思潮是由主张开放海外贸易的官僚们所提出的。所以谓之新思潮，主要是因为他们肯定了海贸符合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的需要，有别于以前两个世纪里所流行的否定意见。开海派官僚们相信海贸的开放是东南沿海人民生活上的一个经济必要，而海贸也因此攸关这些地区的秩序与安定，因此也是北京政权维护其统治权的一个政治必要。”张先生的这种分析是对传统学术观点的一种纠偏。过去往往认为，明朝官方一贯主张禁海闭关，而民间则力争开海贸易，事实上在东南沿海地区商品经济日益活跃的情况下，明朝统治阶级内部，尤其是任职沿海的封疆大吏主张开海贸易者并不在少数，这是一种值得注意的思想发展趋势。但正如张先生所言：“在十六世纪中叶到十八世纪这两百多年期间，中国官僚主张开海的言论中无疑地含有不少可贵的见解与观念，但其论据大多基于对现象的直觉而非逻辑的思维，因此常常流于片断和散漫，谈不上理论的建构。”因此，“在十六——十八世纪的时代，海贸思想仍停留在很粗糙的阶段，也就不足为奇了。”

此外，围绕郑和下西洋所展开的对有关海权思

想、海洋意识等问题研究的论文也有一些。例如时平先生曾经发表《元明时期的海权观念与郑和下西洋》¹³、《中国古代海权观念——论郑和海权的历史地位及其性质》¹⁴、《论郑和海权的性质——兼谈郑和海权研究中的几个问题》¹⁵等一系列论文，认为“郑和海权思想与马汉海权无论在时代背景还是在内容上都有相当程度的区别。郑和海权兴起于十五世纪，人类的活动舞台开始从大陆转向海洋，刚刚拉开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序幕，恰好处在世界传统社会和近代历史萌起的交接点，其根植于中国传统的土壤：传统的文化形态、传统的经济形态、传统的政治形态、传统的科学技术、传统的海洋观念，带有浓厚的民族色彩，打上了明初封建专制的时代印记。滋生在传统土壤的郑和海权的尝试，没有冲破‘传统’的束缚，其结果是被‘传统’所制约和扼杀。而马汉的海权理论形成于世界大航海之后300年，是对十七至十九世纪世界海权发展规律的总结，根植于近代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时代：近代的经济形态、近代的政治形态、近代的科学技术、近代的海洋观念，冲破了‘传统’的束缚和民族的色彩，形成一种‘先进’的理论，在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推动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把两者结合起来，做为探讨海权历史的发展规律无疑是正确的。但用马汉的海权理论机械套搬或做为衡量郑和海权的标准，则脱离了历史的本来面目，无形中否定了海权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概念。”范金民先生在《郑和下西洋前后的明代海防》¹⁶一文中以郑和下西洋为标志，将明初至嘉靖二年（1523年）争贡之役爆发期

间的明代海防视为两个阶段,考察其兴衰的过程,认为“郑和下西洋后明代海防的衰落,既与上下海防观念的淡薄有关,也与明廷开国以来实施的海禁政策有关。”因为,“海禁固然一定程度上有效地阻止了沿海人民下洋,减少了内地人民交通外番的可能,但削弱民间航海力量的同时,实际上也削弱了海疆防卫能力。”

鸦片战争后,晚清中国受到西方海上强敌的有力挑战,有关海防、海战、海军建设的议论日益增多,学术界对海洋观的关注也主要围绕这些方面作了一些探索。

戚其章先生所著《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¹⁷一书,首开篇章即以“中国近代思潮的早期形态——海防思潮”冠名,就鸦片战争前的中西关系、海防运动的肇始与林则徐、海防思潮的兴起等问题进行论述。戚先生认为,经过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冲击和影响,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勃兴的经世思潮发展为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早期形态——海防思潮。“海防思潮不仅在当时有重大的影响,而且对尔后近代思潮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可以说,不了解海防思潮,就无法从整体上触摸到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发展的脉络。”戚先生的另一部新著《晚清海军兴衰史》为专论晚清海军与海防建设成败得失的力作,其中有关对林则徐、魏源等人海防思想和朴素海权观的分析不乏真知灼见。

台湾师范大学王家俭教授撰有《魏默深的海权思想》¹⁸一文,最早对魏源的海权思想进行具有独创性的分析。他认为,海权理论虽为西方世界的产物,

由美国海军战略家马汉的系统阐述而发生令人震撼的影响，但“中国人对于海权问题亦并非完全无人关怀，如湖南学者魏默深（魏源，1794年～1857年）便曾早于马汉数十年前提出过类似马汉海权理论的主张。”遗憾的是，“魏源的海权思想，无论世界，即在他自己的国家——中国，却一直未曾有人注意，这真是有幸与不幸。”王先生还正确地指出：“有一点我们却须要特别地了解，即是：魏氏的海权论乃是站在一个东方被侵略国家的立场，所提出的抵抗西方海权国的一套构想；而马汉的海权理论则是站在西方海权国家立场着笔，虽然其目的乃探讨海权对于历史的影响，可是却不免为西方海权国家张目，无异为帝国主义国家向外侵略建立一个理论的借口。”

杨国宇主编的《近代中国海军》¹⁹，开辟专章探讨中国近代海军军事技术，对海权论与清末海军学术作了系统的分析。专门谈论海权的海洋图书则有张玮与许华合写的《海权与兴衰》²⁰。该书是《海洋意识》丛书的一种，全书共分“海权溯源”、“东方的蓝色求索”、“后来居上的奥秘”、“领导海权新潮的海军”、“中华兴，海权兴”、“现代海权的主题”和“中华海权的理性呼唤”等7章，以活泼通俗的笔调，概要地介绍了海权和海权理论的产生、发展的来龙去脉及其内涵，分析海权对国家兴衰产生影响的原因。

此外，本人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发表过《重议海塞防之争》、《鸦片战争时期传统海防观对清朝统治者的影响》²¹等数篇论文，对近代海防观的产生作过一些探讨。许多近代史学者也对近代海防与海

军建设等问题进行过专门的研究，限于篇幅和条件，不再一一列举。

以上所述，可以说大体上反映了学术界关于明清以来中国海洋观的研究概况。虽然在海贸思想、海禁政策、海防观念、海战方略等方面有过一些专门的研究，但都比较零散，系统性也不足。总的来说，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的专题研究还显得相当薄弱。

三

本书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由于本书讨论的是中国海洋观从传统向近代演变的历程，所以原则上讲当以明清两朝，包括鸦片战争后的晚清为时空定位，但因思想观念的变化是一个延续不断的发展过程，海洋观念作为人类对海洋这一客观世界的认识，也是一个不断丰富、发展和深化的过程，因此，本书的讨论首先以“初识海洋”为题，对中国古代海洋观的产生、形成及其主要特点作一概要性的追溯，而重点则放在明清两朝海洋观的变迁及鸦片战争后海洋观如何在内外双重压力下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历史过程。

本书的基本思路是力图将海洋观的演变历程放入整个中国海洋人文社会的大系统中加以考察和研究，以明清两朝张弛交替的“禁海”、“开海”以及晚清的“借法自强”、“大治水师”等官方海洋政策为基本考察点，以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从初识海洋、走向海洋，而又产生海洋迷思，最后又重返海洋的心路历程为基本线索，拟就中国作为一个既是大陆国家，又是海洋国家的自然环境、海洋文化基因、传

统文化背景、海外贸易条件、“传统内变迁”的活力因素以及西方海上势力东进的影响等方面，以“科际整合”的方法，对海洋观的发展变化作综合、系统和动态的研究。杨国桢先生在多年对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和中国海洋人文社会学进行考察和思考的基础上提出：“事实上，中国比西欧更早怀抱海洋，并以渐进的方式向近代转型”²²；“中华民族包涵了海洋民族的成分，海洋发展是沿海地区的传统，海洋人文是中国社会人文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国走向海洋的力量源泉。”²³

他还认为：“一般而言，海洋社会经济力量的存在是国家（或地区）制定海洋政策的基础，海洋政策的开放程度取决于海洋社会经济力的壮大程度。政策规范海洋经济行为和社会行为，又具有巨大的反作用。海洋政策制订决策系统和执行系统的实际运作，是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然而，我们必须看到，政策对社会经济变化的反映往往是消极的，中国历代的海洋政策与海洋社会经济实态之间一直处于不适应——适应——不适应的矛盾运动之中，而不适应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海洋政策的开放或封闭与海洋社会经济开放或封闭并不是一回事。明代海禁政策是明朝海洋政策的倒退，但实行海禁时期东南沿海的海洋社会经济以民间的方式崛起；清代前期实行海外移民禁令，严办出洋久留或逾期不归者，但马六甲中国移民的数量却直线上升，都是显明的反例。只看海洋政策的开放或封闭趋向，不看海洋社会经济的具体情况，显然是不可取的。在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研究中，需

要把握这对矛盾的辩证关系，跳出海洋政策演变的层面，着重考察海洋政策的实际执行效果。”

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杨先生还主张我们要立足现实，面对历史，“运用‘科际整合’方法，即多学科互相交叉、渗透的方法”，来考察和研究明清海洋观从传统到近代转型的艰难历程，“唯有如此，才有可能在既有的基础上取得实质性的突破。”²⁴

导师的学术指导对我的启发极大，也为我撰写本书理清了基本思路。由于本课题研究最大的困难是史料的零散和匮乏，没有前人系统的研究成果可供参考和借鉴，更让我感到不安的是这一选题时间跨度大，虽说研究重点在明清，但海洋观念的发展却要上溯到唐宋元以前，而清代延续的267年实际上又跨越了两个性质不同的时代。要切实把握海洋观念发展变迁的脉络，并力求客观、准确地表述和概括出海洋观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从传统向近代演变的基本特点和发展规律，揭示海洋观念与国家经济、政治结构和文化传统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对国家和民族兴衰产生的深层影响，委实是我辈学力之所难逮。幸运的是，导师对我错爱有加，不仅在博士论文的开题和写作过程中花费大量宝贵的时间给予悉心指导，而且还时常教导我正确处理好学习与工作的关系，多次鼓励我克服困难完成论文的写作。更令我感动的是，在论文的最后定稿和答辩阶段，导师把痛失爱女杨蔚的巨大悲伤转化为对学生的无尽关怀。可以说，这篇拙稿能够得以如期完成，倾注了导师的大量心血和汗水。在此，谨向恩师表示诚挚的敬意与谢忱！